



渤海走廊：信念铸就的战略通道

□ 丁志伟

（一）

渤海走廊特指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在山东省昌邑县北部、潍县（今潍坊市市区）北部和寿光县北部创建的狭长根据地。渤海走廊东起胶莱河，西至寿光县北部的榆树园子村，东西长大约120里，南北长不过10余里，成为胶东军区与其他战略区的唯一联系通道，影响着山东战局乃至全国战局。这条由无数共产党人信念铸就的战略通道，架起了连接延安的红色生命线。

（一）

1937年9月30日，日军的铁蹄踏进山东。中共山东省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相继开辟出徂徕山、冀鲁边等众多抗日根据地。其中胶东、清河和鲁中三大根据地相互依存，互为犄角。

胶东根据地也称胶东区或胶东军区，系指山东半岛胶莱河以东地区，位于山东省最东部，东北北三面环海，西与清河区相连，西南与鲁中区为邻。大泽山、罗山、艾山、牙山、腊山、昆嵛山等山脉自西而东耸立其境；五龙河、辛安河、大沽夹河、黄水河、界河、王河、大沽河等河流纵横交错；烟（台）潍（县）、烟（台）青（岛）等公路蜿蜒其中。该区是坚持山东抗战的重要战略区。

清河根据地也称清河区或清河军区，位于山东省的东北部，东到胶东区，西靠章（丘）历（城）一线，南跨胶济铁路，北依黄河，包括淄川、寿光、潍县、昌邑等20余县。清河根据地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山东主要粮棉基地，工业及手工业比较发达。

鲁中根据地也称鲁中区或鲁中军区，处于山东腹地，是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经常驻防的地区。东接鲁南区，北连清河区，东北为胶东区，南面是鲁南区，泰山、鲁山、沂山、蒙山等山脉连绵起伏，地势险峻，且向西可以控制津浦铁路，从北可以控制胶济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因为胶东根据地三面环海，其跟外界的联系主要通过鲁中根据地和清河根据地。连通胶东根据地和鲁中根据地的胶（县）高（密）诸（城）莒（县）交通线被日军切断后，连通胶东根据地和清河根据地的渤海走廊，战略地位骤然凸显。

（二）

渤海走廊是抗日战争期间形成的，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

寿光、潍县、昌邑等县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4年4月，寿光人张玉山、王云生经邓恩铭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8月转为中共党员。同年9月，经中共济南地委批准，寿光县的党员和广饶县的党员联合成立寿广支部，张玉山任书记。这是山东建立的第一个农村基层党支部。之后寿光、广饶两县分别建立了党支部。

潍县人庄龙甲，1923年夏由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5年1月，王尽美、庄龙甲又先后在潍县开展建党工作，于2月份建立中共潍县支部，庄龙甲任书记，隶属中共山东地委领导。1926年6月，成立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山东区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派遣昌邑籍的共产党员王兴选到岵山火车站任车务司事，负责山东区执行委员会在胶济铁路的联络工作。共产党员黄复兴、黄世伍分别从济南、潍县被派回昌邑后，与王兴选组成中共昌邑岵山支部，隶属山东区委领导，书记为王兴选，分别开展铁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三）

渤海走廊的形成，是与牛头镇起义、蔡家栏子起义和瓦城起义分不开的。这三次武装起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责任感和救亡图存的勇气。

1937年10月，中共鲁东地区工作委员会（简称鲁东工委）在博山成立，鹿省三任书记，张文通任组织委员，杨涤生任宣传委员。鲁东工委负责以益都为中心的寿光、潍县、昌邑、广饶等十几个县的工作，中心任务是联络失掉关系的党员，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全力发动武装起义。鹿省三主持工委工作并分管昌邑、潍县一带，张文通分管寿光、广饶、博兴一带，杨涤生分管益都、淄川、博山一带并负责与省委联系。

鲁东工委建立后，张文通立即赶回寿光，向寿光县委传达了山东省委关于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决定和

鲁东工委的指示。寿光县牛头镇群众基础好，又靠近长满芦苇的巨淀湖，便于集结、隐蔽和活动。同时家住牛头镇的马保三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党员，既具有地方威望和号召力，又利用国民党湖东乡乡长的合法身份，组建了一支30余人的抗敌后援队。寿光县委决定以牛头镇为中心，发动群众，组建武装，筹备起义，起义部队的番号为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

在寿光县委筹备牛头镇起义的同时，鹿省三来往于昌邑、潍县两县，部署发动武装起义。1937年年底，鹿省三在潍县华庵村召开筹备起义领导人会议，潍县起义部队的番号为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

1937年12月29日和1938年1月27日，起义顺利进行，第八、七支队先后成立。4月5日，鲁东工委在昌邑龙池村召开第七、八支队大队以上干部会议，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部，下辖第七、八两个支队，由马保三任指挥，韩明柱任副指挥，鹿省三兼任政委。

龙池会议还根据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和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的邀请，决定第七、八支队东进胶东与胶东部队协同作战，共同创建根据地。第七、八支队最终离开了昌邑、潍县和寿光，但其播撒的抗日火种已成燎原之势，其树立的抗日旗帜，一直在渤海南岸飘扬。

（四）

渤海走廊的巩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英勇斗争的献身精神。

抗日战争期间，日伪军在渤海走廊附近驻有重兵。单就昌邑县而言，大约两千多名日伪军驻扎在县城和北部柳疃、青乡、李泊等沿海据点。他们依恃着精良武器，严密控制了昌（城）柳（疃）和昌（城）下（营）等公路，不断轮番扫荡，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几路国民党土顽部队各自盘踞着大片地盘，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从1941年春开始，敌人对昌潍根据地频繁扫荡，消灭抗日武装。昌邑北部地区是一片平原，地势不利“反扫荡”。受冀中平原抗战经验启发，昌邑独立营和昌邑县委组织根据地军民在平地上挖沟，改造地形。经过一个冬天，“抗日沟”像蜘蛛网一样出现在

昌北大地上，做到了村村相通、沟沟相连，军民外出行动均在地平线以下。昌邑独立营利用“抗日沟”作战、转移，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敌来我跑的被动局面。“抗日沟”挖得最好的瓦城、马渠一带，被战士们称为“小莫斯科”。

1941年12月，日伪军为了封锁渤海走廊，分割昌北根据地，决定从刘家车道村经青乡村向北挖一条宽10米、深5米、长20华里直达海边的壕沟。昌邑独立营选派十几名干部、战士组成小分队，乔装打扮，带短枪混入工地，枪杀伪军，反复破坏。历时一个月，最后迫使日伪军放弃挖壕计划，反对日伪挖壕斗争取得胜利。

潍县县大队、昌潍游击大队、昌邑独立营、昌潍独立团等英雄部队，以钢铁般的意志奋战在渤海走廊。他们依靠广大民众，艰苦卓绝地反“扫荡”、反“蚕食”、反顽军、反封锁，以智慧、信念、忠诚和鲜血维护着渤海走廊的畅通，一直到抗战胜利。

（五）

渤海走廊早已成为历史，但中国共产党人带有鲜血的足迹却越来越清晰。因为渤海走廊畅通无阻，胶东根据地才可能将大量黄金、药品及其他物资转送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乃至延安。在14年抗战中，山东军区向延安运送了至少13万两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黄金是从渤海走廊输送到山东军区的。据胶东抗大支校校长贾若瑜回忆，1940年冬，他带着两个营和十几匹骡马，每匹骡马驮四个箱子，每个箱子装1000两，连长、指导员50两，他带100两，途经渤海走廊将3万多两黄金运到山东分局。因为渤海走廊畅通无阻，胶东根据地的大批干部才得以到各种干校接受培训。因为渤海走廊畅通无阻，山东省党政军乃至延安派往胶东根据地的大批干部才能安全抵达目的地。如1941年2月，许世友率清河独立团东进胶东组织反投降战役，以及同年9月贾若瑜带山纵五旅青年营到鲁中，都是经过的渤海走廊。



重叠设伏的七亘村伏击战

□ 尚 伟 张大海

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凭借借有利地形，大胆巧妙地在位于今山西省平定、昔阳与河北省井陘三县交界处的七亘村重叠设伏，3天之内于同一地点，用同一支部队，连续两次伏击同一股敌人，均以小的代价取得重大胜利。这一任务用谋、机动灵活的经典战例，曾被选入“世界经典百战”。

见机而作巧设伏。1937年9月下旬，侵华日军大举进攻山西，在忻口遭八路军和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部队有力阻击，被迫改由正(定)太(原)路西进。10月中旬，国民党守军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晋东门户娘子关告急。

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时任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部火速向娘子关东南及以南日军侧后进发，寻机歼敌。为阻日军西进，刘伯承指示第386旅第771团在平定县桃家岭、七亘村一线采取运动防御，争取时间，同时调第772团回马山村，准备侧击西进日军。10月22日，第771团在七亘村修筑阵地时被敌机发觉，当晚遭到日军第20师团1个联队和200多骑兵袭击，伤亡30余人，一时与师部失去联络。

25日，刘伯承带着参谋、政工人员及警卫班共30余人到七亘村南三郎庙一带察看地形，寻找失联部队。刘伯承发现，七亘村附近道路宽不足2米，路南边大部分是高出10米的土坎，北边是几十米深的山沟，乃理想的设伏之地。当天，又获悉日军第20

师团已向平定方向进犯，其轴重部队1000余人，尚留在距七亘村仅10公里的测鱼镇宿营。刘伯承判断，敌次日必经七亘村向平定输送军需物资，当即决定打一场伏击战，并将任务交给了386旅旅长陈赓。

受领任务后，陈赓令下属772团3营及特务连1个排在七亘村附近隐蔽待敌。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辎重部队向西开进。9时许，772团有意放敌先头部队让其通过，待其辎重骡马进入伏击圈内，抓住有利战机，突然发起攻击。由于道路狭窄，日军兵力无法展开，火力不能发挥，只得狼狈逃窜。此役共毙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及大批军用物资，还缴获华北、山西两份军用地图，敌军仅有少数掩护部队和辎重骡马逃回测鱼镇，我军只伤亡10余人。

反常用兵再设伏。129师旗开得胜，刘伯承的心情却并不轻松。一方面，国民党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兼13军军长汤恩伯电话告知，他们已决定放弃娘子关，并劝129师也赶紧撤退；另一方面，26日当天得到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翼日军也继续向旧关抄袭。撤，还是撤？刘伯承仔细分析了日军企图，认为日军侵占华北以来，作战一直比较顺利，目空一切，不会在意小的损失，如果国民党后撤，日军必以阳泉为目标发动大规模追击。当前日军正向平定进犯，急需军用物资，根据交通条件，七亘村是日军必经之路。而

且，“用兵不复”是作战常理，如果再次在七亘村设伏，日军恐难预料。经深思熟虑，刘伯承一反常规，决定在七亘村再次伏击。

27日，测鱼镇之敌一面派出部队在七亘村附近收敛尸体，一面调整力量准备继续西进。我军在刘伯承指挥下，佯装他去，待敌人收尸完毕后，再次令772团3营在七亘村设伏。28日上午，日军辎重部队果然循原路而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敌先头部队骑兵首先进入伏击圈，敌警戒搜索甚严。我军战士沉着镇静，待敌骑兵通过，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区后，对敌发起猛烈袭击。由于日军组织较前严密，掩护部队较多，又因天雨路滑，我援增部队未能及时赶到，致使部分敌人逃脱。这次伏击，虽未达到全歼目标，但也击毙日军百余名，缴获骡马几十匹，起到了牵制敌人的作用，使困在旧关以南的国民党曾万钟部1000余人得以从敌包围中解救出来。七亘村两次设伏虽然规模都不算很大，却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鼓舞了军民士气，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是抗战初期我军在山西抗日前线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

七亘大捷传经典。刘伯承在作战上有句名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所说的“五行”，即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在刘伯承看来，指挥员每战之前如果不把这五件事搞清楚，必会损兵折将。七亘村伏

击战的制胜关键，正在于刘伯承的明察秋毫和深谋精算，在于他对“五行”的准确把握和对兵法的灵活运用。正是刘伯承精妙的指挥艺术和高超的兵学智慧，使七亘村伏击战成为战争史上的经典。

战斗结束后，当刘伯承慷慨地将部分战马、军刀、大衣等战利品送给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时，卫立煌钦佩不已，认为七亘村“重叠待伏”是“兵家所忌”的一次大胆妙用，表示“还是八路军机动灵活的战术好”。

研战知战方能胜战。研究经典战例，是提高指挥员指挥素养的重要途径。七亘村伏击战中，刘伯承细致勘察地形，善于抓住战机，大胆反常用兵，这种思维和胆识，对现代战争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军事指挥员不仅要密切跟踪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和现代战争演变趋势，密切关注科学技术对现代战争的影响，深入研究现代战争制胜机理，还必须在每一次实战中首先把作战对手“摸透”，把自己“摸清”，把应敌之策“搞准”，做到料敌在先、掌握主动。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思维定式，因势而谋，出奇制胜。



“儿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但烈士殷红的血迹燃起了儿的满腔怒火，乱葬岗上孤儿寡母的哭声斩断了儿的万缕归思。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受天年，儿已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这是王尔琢写给远在湖南老家的父母的一封信。信中除了表达因参加革命而无法常陪伴在家人左右的愧疚之情外，更展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以天下为己任，舍小家、为大家的战斗和牺牲精神。回顾王尔琢25年的一生，家信中所说的“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正是他最真实的写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矢志奋斗的生动体现。

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王尔琢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官桥村，在读完私塾和小学后在1920年7月考入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在校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希望依靠学到的工业知识将来实业救国，挽救民族危亡。1922年春，湖南省劳工联合会的负责人黄爱、庞人铨等被军阀杀害，党领导长沙人民开展了反对军阀统治、资本家压榨工人的斗争。王尔琢也带领同学们上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抗议军阀的暴行。在实际斗争中，他目睹了劳苦大众的穷困潦倒和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对实业救国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开始重新思考救国救民之道。就在这时，他认真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终于懂得要实现劳苦大众彻底的解放，就必须实行革命，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

1924年王尔琢奔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被成功录取。在校期间，他表现优异，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对他也颇为赏识，时常找他谈话，勉励他要不断进步。10月王尔琢指挥黄埔军校学生军分队，配合其他力量，平息了广州商团叛乱。年底，王尔琢在周恩来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王尔琢又参与了东征陈炯明、平定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叛乱的战斗。1926年王尔琢作为东路先遣军的党代表出师北伐。在行军过程中，他认真履行党代表的职责，提出部队的革命宗旨，颁布革命纪律，并经常向部队讲述北伐战争的重要意义和目的，讲述官兵们的责任。因此，这支北伐部队拥有崭新的精神风貌，得到了沿途老百姓的支持。由于王尔琢部署得当，全军将士英勇奋战，经过数日激战，攻克桐庐县城，为北伐军进军浙江开辟了通道。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尔琢到了武汉。7月他接受党的派遣，开始担任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

参加南昌起义后的艰苦转战

王尔琢所在的二十五师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后部队南下广州，经历三河坝战斗，与敌黄绍竑部恶战三昼夜，由于寡不敌众，在受挫后撤出战斗。后与潮汕突围出来的少数队伍会合，部队决定退出广东，转战闽粤边境，以保存革命力量。

连续的行军作战生活极其艰苦。起义部队不仅面临敌人的围追堵截，自身更是处于思想混乱、伤病严重、缺衣少粮的困境之中。为了保住这支起义队伍，王尔琢不仅要协助朱德指挥打仗，而且常向指战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一边走一边给战士们讲述革命的道理，有时还唱起京戏或家乡小调，活跃气氛，鼓舞士气。一到宿营地，他又主动找一些干部、战士谈话。在王尔琢等人的努力下，部队开小差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这段时间王尔琢终日繁忙，一连几个月都顾不上理发，胡子也长得很长，有一回何长工对他开玩笑说：“你现在满脸胡须，简直像马克思了。”王尔琢笑着答道：“革命不成功，我就不剃头，不刮胡子了！”这虽然是谈笑之言，却表

王尔琢：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

□ 张嘉升

现出他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在部队训练上，王尔琢也时刻停不下来。他每天都到现场进行指导，并给战士们做示范动作，在地上摸爬滚打。起义部队在整编后正式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王尔琢任参谋兼长。不久，王尔琢根据朱德的部署，指挥歼灭许克祥师1000余人，攻克了几个县城，积极发动农民建立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使革命的浪潮席卷湘南。

井冈山上的得力干将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部队与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5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宣布成立，王尔琢担任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作为红四军的领导人之一，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每次战斗他都亲临火线直接指挥。在永新的一次战斗中，王尔琢指挥部队，极速行军进攻永新，而敌方将领杨如轩却在司令部里听留声机，闻得枪声大作，落得个慌忙奔逃、被流弹击伤的下场，打得敌军措手不及，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战后，有人赞颂王尔琢率领的二十八团是“飞兵天降永新城”，王尔琢也得到了“飞兵团长”的美誉。在井冈山时期，王尔琢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壮大和红军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8年7月，刚编入二十八团的二营营长袁崇全胁迫五个连叛逃。第二天，有三个连的干部识破了袁崇全的阴谋，率部下归队，但还是有两个连被他带走了。王尔琢听到消息，自告奋勇率队去做叛逃官兵的工作，以期挽回损失。王尔琢迫至叛徒躲避的屋前，一边不断靠近，一边高声喊，“不要打了，我是王尔琢，是接大家回去的！”但就在此时袁崇全突然开枪射击，王尔琢躲闪不及，中弹倒在血泊之中。最终，被袁崇全拉走的五个连全部归队，王尔琢却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时他仍是一捧长髯，飘洒胸前。

1928年10月中旬的一天，在追悼王尔琢大会上一副由毛泽东起草、陈毅书写的挽联格外醒目：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这副挽联充分肯定了王尔琢的不朽功勋，号召将士们继承烈士遗志，战斗至革命的最后胜利。

